

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形成机制研究

湛飞龙,涂艳萍,蓝金鑫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企业营商环境感知直接关系到其投资决策、创新活力和长远发展。然而,营商环境同源性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感知的一致性,相反,异质性的感知结果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以不同规模、所有制形式、所处地区和产业类型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企业在复杂营商环境下的感知形成机理,构建出“政策信号输入—注意力配置—感知输出—行动反馈”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组合、融贯性与执行力的差异催生异质性政策信号,成为感知差异的结构性前因;企业通过关注(政策信号聚焦)和解释(政策信号解码)双环节差异化配置注意力,输出效能、成本、公平、可预期性的异质性感知组合;基于感知差异,企业采取战略重构、资源再分配、环境反哺等反馈行动,反向作用于政策供给与执行,形成政企互动的动态演化循环。研究进一步提炼出红利捕获型、机会响应型、赛道布局型三类代表性企业,对比了其感知形成路径与结果差异。研究结论对破解“政策普惠性与企业获得感”错位难题具有重要启示,为精准识别企业需求、动态优化制度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政策工具组合;政策执行力;注意力配置;企业营商环境感知

中图分类号:F27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6)08 - 0172 - 13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irms' perceptual differenc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HEN Feilong, TU Yanping, LAN Jinxi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A company's percep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directly affects its investment decisions, innovative vita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ame business environ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same perceptions among businesses. Yet, heterogeneous perceptions are widespread, a phenomenon that warrants in-depth exploration. Based on policy instrument theory and the attention-based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enterprises of varying sizes, ownership structures,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industry types. Using a procedural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study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of corporate perceptions in complex business environments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olicy signal input—attention allocation—perception output—action feedback.” The study finds that differences in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their coherence and enforcement capacity unleash heterogeneous policy signals, which serve as structural precursors to perceptual differences. Enterprises differentially allocate their attention through two stages—focus (policy signal focus) and interpretation (policy signal decoding)—resulting in a heterogeneous combination of perceptions regarding efficacy, cost, fairness, and predictability. Based on perceived differences, enterprises take feedback actions such as strategic restructuring, resource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研究”(23ZDA055)。

作者简介:湛飞龙(1977—),男,江西高安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营商环境、创业营销等。

reallocation, and giving back to the environmental,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policy pro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ultimately resulted in a dynamic evolutionary cycle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interaction. The study further identifies three representative types of enterprises, they are dividend-capturing, opportunity-responsive and market-positioning, then compare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ir perceptions are formed and the resulting differences. The conclusions offer important insights for resolving the mismatch between “policy universality and enterprises’ sense of benefit,”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ccurately identifying enterprise needs and dynamically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provision.

Key words: portfolio of policy instrumen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capacity; attention allocation; businesses’ percep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勾勒出优化营商环境的蓝图。近年来,政府围绕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政务服务等维度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夯实营商环境制度根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障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1]。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优劣有着最直接的感知^[2],且企业行为受宏观政策波动的影响,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直接关系到其资源配置、创新活力和经济潜力^[3]。当企业因整体营商环境感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会采取调整投资或加速学习等举措以适应环境变革^[4];而当企业对政策环境持有积极预期时,则倾向于深化市场洞察、积极搜寻投资机会。

然而,企业对营商环境的积极预期及其驱动效应并非普遍发生。实践中,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非均衡分布特征^[5]，“政策普惠性”与“企业实际获得感”错位成为现实难题。不同规模、所有制形式、所处地区和产业类型的企业,即便身处同一政策体系,对营商环境的评价也存在明显分化。如规模不同意味着企业在资源禀赋、组织结构呈现出不同特点^[6],大型企业通常资本实力雄厚、市场根基扎实,相较于小微企业更具弹性与适应性,对营商环境持更积极态度。这一“同源环境、异质感知”现象,不仅削弱政策实施效能,也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痛点。因此,在当前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建设阶段,同一营商环境下企业感知差异是否具有系统性特征?差异形成机制与作用路径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当前理论研究的关键议题,也是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企业获得感的重要突破口。

针对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这一现实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宏观层面的营商环境评价与满意度研究,侧重于构建客观评价指标体系,量化研判各地区、省份及城市间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与分异特征^[5],其隐含假设是“环境越优,感知越佳”;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特征差异研究,识别了规模、所有制类型等影响因素,揭示了不同特征企业存在显著差异^[7]。上述视角对企业选择性认知的能动建构过程关注不足,难以系统解释差异的内在生成逻辑。为弥补上述局限,本文引入政策工具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构建整合分析框架。政策工具的选择与配置是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着力点^[8],其组合模式与落地执行直接决定着政策实施成效^[9],进而生成差异化政策信号,构筑起企业认知研判的基础框架。而注意力配置构成了将外部政策信号转化为内在感知的关键解码机制,企业间关注焦点与配置策略各不相同^[10],直接影响感知结果。两大理论以“政策信号呈现”为纽带实现对接:政策工具的配置与执行持续输出政策信号,企业在此动态环境中配置注意力进行聚焦与解码,形成异质性感知,并基于感知差异采取行动反馈,反向作用于后续政策供给与执行,形成持续演化的动态循环。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政策工具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的分析框架,深入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动态调整注意力配置而产生差异化的政策感知?第二,基于上述感知形成机理,能否识别出不同企业的典型感知路径,各类企业在感知与响应上存在哪些系统性分野?第三,政策工具的结构特征与企业的注意力配置策略如

何交互,进而生成最终的感知结果?本文结论将揭示政策工具与注意力配置的动态耦合机制,为认识政策感知差异的系统性规律提供理论支撑,并为破解政策传导中的认知鸿沟、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有益启示。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企业营商环境感知

不同于以客观指标为核心的营商环境评价,企业营商环境感知是企业作为政策接受者角色下对外部环境的主观认知与价值判断。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构建,聚焦于企业对营商环境整体或其中某一维度的评价^[11];二是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研究,涵盖满意度模型构建^[2]和满意度效应^[12]等,并据此为提升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提出优化建议;三是企业在实际情境中的营商环境感知,如有学者从营商环境感知作用机制^[13]等维度进行探讨。

学界还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解释不同企业为何会对同一营商环境产生不同评价。企业规模方面,各类企业对财政支持的看待方式存在区别,体现了企业规模直接影响政策环境认知^[14]。所有权性质方面,民营企业对金融体系发展水平高度关注,而国有企业则对腐败程度尤为敏感^[7]。所处地区方面,研究发现辽宁省与浙江省企业所感知的营商环境质量存在不同^[15]。其他方面,Angelino等^[16]根据属地化程度和竞争力水平等特征,分析了企业对营商环境约束感知的异质性,这些研究初步证明了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的存在。综上,本文将营商环境感知定义为:企业基于自身战略位势、资源禀赋与认知框架,对政策供给、执行效能及制度规则等信息进行选择关注、认知解码与意义建构后,最终形成的多维主观判断。

对于企业为何会对同一营商环境形成不同认知,企业异质性视角尚不能给出充分解释。事实上,营商环境由政府制度供给与市场环境共同塑造,除企业自身属性外,差异化外部制度信号也会改变企业感知。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从制度供给端出发,探究政府通过何种政策工具塑造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认知。

(二)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研究

政策工具是政府传递制度信号的核心载体,衔接制度设计与企业行为,其结构特征、传递方式与执行效能共同构成企业感知的信息环境。在营商环境优化进程中,政策工具选择是否契合统一大市场建设底层逻辑,配置是否匹配市场主体异质性需求,直接影响制度规则落地效果与企业感知质量。已有研究聚焦于工具类型学构建与配置有效性评估,应用较广的分类法包括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自愿性—强制性—混合性、命令型—劝诫型—能力建设型—系统变革型。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发现单一政策工具效果受制度情境与企业类型显著制约,工具的组合配置与协同机制对治理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刘聪等^[17]揭示了不同类型工具组合对营商环境评价结果的差异化影响,指出优化营商环境需要供给、环境、需求型政策工具协同发力;罗兴武等^[18]发现政策工具与政策主体的协同能够有效缓解政策目标间的冲突互斥与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

现有文献多将政策工具视为影响企业行为的客观因素,重点关注创新绩效、数字化转型等实施效果,将企业预设为同质性的被动接收主体。政策工具如何被企业差异化地关注、识别、解读与内化,这一认知传导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

(三)注意力基础观

政策工具并非直接作用于企业行为,而是经由决策者认知加工转化为实际响应。作为制度性外部信号,政策工具通过塑造信息环境来影响注意力分配,催生差异化的营商环境感知。注意力基础观强调企业是“有限注意力系统”,依靠选择性聚焦来应对外部信息过载^[19]。营商环境是影响注意力配置的关键环境要素^[20],企业注意力配置反过来也会制约营商环境感知。在动态变化情境中,企业注意力配置呈现结构性偏向与适应性特征,如制度压力促使企业聚焦合规性,市场竞争则驱动企业关注创新机会^[21]。同时,面对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双重制约,企业会通过学习持续提升认知能力,进行适应性重构。基于此,注意力基础观通过解构企业如何在有限理性下选择性关注

和解读环境信号,能够为不同企业对同一营商环境形成差异化感知提供关键理论视角。

本质上,组织行动取决于注意力聚焦的议题与解决方案,而这又取决于所处的具体情境^[22]。作为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的知识基础之一,制度逻辑有助于理解注意力配置,具有不同制度逻辑的企业,注意力的配置方向和对象也会表现出差异^[23]。政策工具作为政府逻辑的具象化载体,能够将政府逻辑从抽象价值信念转化为具体干预行动,是塑造企业注意力配置情境的关键抓手。基于此,企业对政策环境变化的关注程度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在不同产业与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尤为突出^[24]。这恰恰印证了,政策工具作为外部制度信号,与企业的内部认知框架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注意力的最终配置。

营商环境直接决定企业可获取的资源条件^[25],进而影响其创新活力与高质量发展,这种战略重要性促使企业投入注意力去关注和解读政策信号。面对同一营商环境下企业的差异化感知,政策工具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可形成完整的分析框架:前者回答“政府供给了什么”,界定了政策工具的组合类型、融贯性与执行力,决定了政策信号呈现的客观特征;后者解释“企业如何选择性认知”,揭示了企业如何通过关注与解释对有限注意力进行差异化配置。二者通过“政策信号呈现”实现对接——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转化为客观信号输入,构成企业注意力配置的起点。企业在此基础上进行认知加工,形成差异化感知。这一整合框架既阐明了感知差异的结构性前因,又揭示了其形成的微观机制。

(四)研究述评

上述文献从三个层面为理解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奠定了重要基础:企业营商环境感知研究确认了感知结果的企业异质性,提供了问题起点;政策工具研究揭示了制度供给端的工具类型与配置逻辑,为分析政策信号生成与输出搭建了结构性框架;注意力基础观从认知端切入,为解释感知差异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理论工具。然而,现有研

究尚未形成能够完整解释“同源环境、异质感知”现象的分析体系:第一,营商环境感知研究多止步于表层特征归因,未能揭示从政策信号传递到企业认知解码的完整传导逻辑;第二,多侧重于宏观制度逻辑与组织战略行为的关联,尚未聚焦于政策工具这一具体制度载体如何通过塑造企业注意力配置来影响其感知形成;第三,多采用静态或截面视角,难以捕捉政策工具、注意力配置与企业感知之间动态迭代的交互过程。为此,本文提出政策工具—注意力整合框架,动态追踪不同政策工具组合下企业注意力配置的演化路径,揭示制度同源性与感知异质性之间的内在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解析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的生成逻辑。选择该方法的原因如下:第一,感知差异形成涉及政策工具与注意力多阶动态交互,具有强情境性和过程依赖性,需回答“差异如何生成”的过程性问题,扎根理论适用于探索“如何”与“为什么”的问题;第二,现有文献对政策工具和注意力配置影响企业营商环境感知的互动机制缺乏系统整合,定量研究易陷入变量孤立化困境,扎根理论通过持续比较法和理论编码,兼具归纳与演绎功能;第三,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感知具有多维模糊性,结构化问卷难以捕捉语义差异,扎根理论能够从具体实践中提炼出完整叙事线。

(二)样本甄选

本文按照概念发展要求,抽取能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样本选择考虑如下:首先,访谈对象应对营商环境具备一定认知,以民营企业高层为主,兼含与政府对接行政审批事项的人员;其次,为确保样本多样性和代表性,访谈对象覆盖不同规模、所有制形式、所处地区和产业类型的企业;最后,研究样本数的确定以理论饱和为原则。本研究于2024年9月—2025年2月开展访谈,共选取来自23家企业的35名受访者作为样本。最终以30名高层管理者与政府对接专员作为正式研究对象,预留5名受访者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

表 1 访谈企业与受访者基本信息

企业信息				受访者信息			
项目	分类	样本数	占比/%	项目	分类	样本数	占比/%
规模	100 人以下	4	17.39	职位	董事长	8	26.67
	100 ~ 499 人	9	39.13		总经理	18	60.00
	500 ~ 1 000 人	7	30.43		政府对接专员	4	13.33
	1 000 人以上	3	13.04	性别	男	20	66.67
所有制	国有企业	5	21.74		女	10	33.33
	非国有企业	18	78.26		30 岁及以下	4	13.33
所处地区	东部地区	7	30.43	年龄结构	31 ~ 40 岁	9	30.00
	中部地区	12	52.17		41 ~ 50 岁	13	43.33
	西部地区	3	13.04		51 岁及以上	4	13.33
	东北地区	1	4.35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下	3	10.00
产业类型	第一产业	2	8.70		本科	21	70.00
	第二产业	8	34.78		硕士	5	16.67
	第三产业	13	56.52		博士	1	3.33

注:0.01% 由数值修约导致,属正常统计误差。

(三)数据来源

根据三角验证原则,本文采用多源、多类型的数据收集方式。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获取主要数据,访谈对象包括来自 23 家样本企业的 30 名高层管理者与政府对接专员,聚焦政策解码行为与感知演化等问题,并将这 30 位受访者分别编码为 A1 ~ A30,将其所在企业分别编码为 B1 ~ B23。二手资料有三类:一是企业公开资料,涵盖官方网站、新闻稿、企业年报等,将这些资料分别编码为 C1 ~ C82;二是企业内部会议纪要等资料,并分别被编码为 D1 ~ D13;三是与营商环境直接相关的中央与地方政策文件,将这些文件分别编码为 E1 ~ E37。

三、研究结果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程序分为贴标签、概念化和范畴化三个步骤。研究团队对所收集数据逐字逐句转录、整理及分析,利用 Nvivo 20 对数据进行编码和标签添加,从原始文本中提炼初始概念,进而挖掘出概念范畴。3 名研究人员独立背对背编码,交叉核讨论,对差异内容反复商榷。经领域内多位专家校对确认,最终归纳出 80 个范畴及其下属的 332 个概念。部分开放式编码结果见表 2。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所获范畴进一步区分、聚焦与凝练的过程,旨在将孤立的范畴重新整合并建立联系。主轴编码过程分为三个阶段:①对 80 个初始范畴不断比较,合并意义相近者形成副范畴,并依据理论视角命名;②以政策工具—注意力视角为线索,深入分析副范畴,将其归纳为更高层次的

主范畴;③邀请受访者和领域专家对范畴体系进行讨论,基于反馈修正优化。由此,本文将 80 个初始范畴提炼为 24 个副范畴,并析出 8 个主范畴(见表 3)。

表 2 部分开放式编码示例

初始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资金支持	E2 推动惠企财政资金直达快享,依托“一企来办”平台和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加快直达快享功能建设,实现省级惠企财政资金线上兑付(资金兑付);E5 持续深化“中标贷”、“政采贷”、融资租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融资支持)
人才支持	E3 推广“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等培训模式(人才培养);E3 持续推进人才分类评价,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评价)
...	...
政策稳定性预期	A18 政府现在服务意识很强,但同时割裂严重。具体来说,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这条线和那条线之间打通还有难度(横向部门稳定);A23 我认为线上线下要有效结合,实践中,政府在这块还有一定提升空间(线上线下协调);E2 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相关责任人调整等为由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与市场主体签订的有效合同,不兑现或者迟延履行承诺的合法优惠条件(纵向政策兑现)
执法一致性预期	A4 多地政府推行“信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广“轻微免罚”“首违不罚”,执法监管越来越有“温度”了(执法监管的灵活性和人性化)
...	...
标准参与	A13 鉴于潜在廉政风险及舆论误解,部分政府部门在和民营企业互动时格外谨慎,甚至刻意保持距离(服务距离);A15 政府全面推动“高效办一件事”改革,服务越来越好了,节省时间的同时还大幅提高了效率和质量(服务效率)
税费负担	D9 应该说这次国家重大税收政策的出台,给我们企业减轻了负担,这种优惠资源更多的会用于市场运营和企业管理提升(税收优惠)
...	...

注:A** 表示本研究从第** 位受访者的原话中所提炼的初始概念,C**、D**、E** 分别表示本研究从第** 份公开资料、会议纪要、政策文件中所提炼的初始概念。

基于营商环境政策契合性与实践可操作性,本文采用“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分类法,对访谈企业所在省份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行分析。供给型副范畴聚焦要素供给与服务保障,需求型副范畴侧重市场需求激活与资源整合,环境型副范畴围绕制度环境与规制建设。三者功能维度不同,但均指向“政府通过差异化手段营造营商环境”基本逻辑,因而整合归纳为主范畴“政策工具组合”。同时,保持政策工具在横向场域内的互补与纵向时间维度上的连续尤为关键,二者共同避免工具碎片化与逻辑冲突,将其归纳为主范畴“政策工具融贯性”。

表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范畴
政策工具组合	供给型	资金支持、人才支持、技术支持、基础设施、政务服务
	需求型	市场塑造、政府采购、示范工程、服务外包、贸易管制
	环境型	税收优惠、法治建设、政府监管、保障措施、目标规划、财政金融
政策工具融贯性	互补性	目标协同、手段匹配、资源协调
	连贯性	战略稳定、迭代可预期、规则内在一致
政策执行力	执行效能	流程复杂度、办理时效、数字平台可及性、目标达成度、执行规范性
	执行一致性	跨区域标准统一、跨部门协同、自由裁量空间
	执行刚性与弹性	法治底线、严格监管、包容审慎、指导服务
	执行响应	沟通反馈渠道、诉求回应效率、动态调整意识
政策信号呈现	信号可解码度	文本明确性、信息可及性、解读充分性
	信号强度	宣传动员强度、激励/约束强度、资源配套可见性
	信号真实度	政策—执行匹配、政策间协同性、纵向稳定性
关注(政策信号聚焦)	注意力聚焦方向	短期机会主义、长期建构主义
	注意力配置对象	要素供给、市场机会、制度规则
解释(政策信号解码)	归因导向	外归因、内归因、交互归因
	意义建构	机会识别、风险预警、策略建构
	认知适配	需求匹配度、规划适配度、能力契合度、价值兼容度
企业营商环境感知	效能感知	便利感、高效感、服务获得感
	成本感知	税费负担、制度成本、合规风险
	公平感知	竞争公平、资源获取公平、权利保障公平
	可预期性感知	政策稳定性预期、执法一致性预期、长期发展安全感
行动反馈	战略重构	业务组合调整、竞争定位转换
	资源再分配	知识资源再分配、运营资源再分配
	环境反哺	舆论引导、标准参与、政策建言

政策落实是将政策工具从文本规定转化为企业可感体验的关键环节。然而,在政策周期内,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强度与治理成效并非整齐划一^[26]。地方政府可基于任务情境调整政策落地的弹性限度,亦可围绕上级政策导向对工作事项进行优先级排序,以此纾解执行压力。这些差异化表现集中体现为执行效能、执行一致性、执行刚性与弹性、执行响应四个维度的分化,整合归纳为主范畴“政策执行力”,界定为制度供给从文本转化为可感信号的传导效能。

政策执行力的异质性不仅影响政策落地效果,更直接导致传递至企业的政策信息形态分化。这种分化通过信号可解码度、信号强度与信号真

实度予以体现。三者均指向企业可直接感知的政策信息特征,构成政策从执行到企业认知的信息传递终端,将其整合归纳为主范畴“政策信号呈现”,界定为政策执行后向企业输出的、外生于企业认知的可感客观政策输入。

企业注意力配置过程表现为“关注—解释—行动”^[27],“关注”决定企业从复杂制度环境中提取哪些关键信号,回答“企业看什么”的问题,侧重于注意力选择性分配。在此过程中,企业的注意力聚焦方向和配置对象共同决定了其战略认知基础^[28],归纳为主范畴“关注(政策信号聚焦)”。“解释”承载着企业对所关注信号的认知转化功能,回答“企业怎么看”的问题,侧重于信号的意义赋予与价值判断。同类政策信号在企业间的解读逻辑截然不同,进而催生差异化环境认知,据此将归因导向、意义建构、认知适配进一步归纳为主范畴“解释(政策信号解码)”。

顾客满意度模型将感知划分为感知质量、感知价值两大维度,相关成果已延伸至公共服务与营商环境领域。结合营商环境特质与企业认知逻辑,本文对感知维度进行情境化延展,提炼出包含效能、成本、公平与可预期性四个副范畴的“企业营商环境感知”主范畴,四类感知各有明确指向。此外,组织的决策和行为是注意力分配的结果^[19],企业基于营商环境感知会产生后续行动,战略重构、资源再分配、环境反哺展现了感知后的动态反馈过程。本文将这三个副范畴归纳为主范畴“行动反馈”,既对应注意力分配的最后一个环节,也体现企业对营商环境的适应性与互动性。

(三) 选择性编码

通过反复比较主范畴间逻辑关系,确定了“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形成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在此基础上,挖掘出以企业营商环境感知为核心的故事线:政府端的政策供给与落地执行是营商环境建设的基础支撑,通过政策工具类型选择与融贯性把控形成系统性政策供给,再经由执行工作将文本政策转化为落地行为,以政策信号呈现

为载体输出结构化政策信息,构成企业感知的直接信息源。企业受注意力资源有限性影响,基于“关注(政策信号聚焦)”与“解释(政策信号解码)”两大环节对政策信号进行差异化认知加工。不同企业的注意力聚焦方向与配置对象存在差异,对信号的归因导向、意义建构与认知适配也各不相同,直接导致效能、成本、公平、可预期性四个维度的异质性感知组合。基于上述感知差异,企业采取战略重构、资源再分配、环境反哺等反馈行动,反向作用于政府的政策供给与执行,完整呈现出“政策信号输入—注意力配置—感知输出—行动反馈”的动态机制(主范畴所构建的关系结构见表4),并据此构建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形成机制模型图(见图1)。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内涵
政策工具组合 + 政策工具融贯性→政策执行力	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工具对应不同执行任务与约束条件,融贯性则决定多类工具在落地时是相互增强还是彼此掣肘,二者共同框定了执行主体的行为空间
政策执行力→政策信号呈现	政策执行力是将制度文本转化为可感信号的直接传导机制。高效、一致、平衡、响应的执行能够最大程度保留政策原意,使信号清晰可辨、稳定可信
政策信号呈现→关注(政策信号聚焦)	信号呈现是企业认知加工的客观起点,依据资源禀赋、组织身份定位与战略优先级,企业有选择性地聚焦关键政策信号
关注(政策信号聚焦)→解释(政策信号解码)	企业对前期聚焦的政策信号进行认知处理,通过归因分析、意义建构等方式,完成深层次逻辑解码
解释(政策信号解码)→企业营商环境感知	企业解释方式与角度各异,形成差异化感知,包括对营商环境效能、成本、公平、可预期的综合评估
企业营商环境感知→行动反馈→政策环境反塑	企业基于具体感知,采取战略重构、资源再分配等反馈行动,反作用于政策信号输入环节,影响营商环境,形成动态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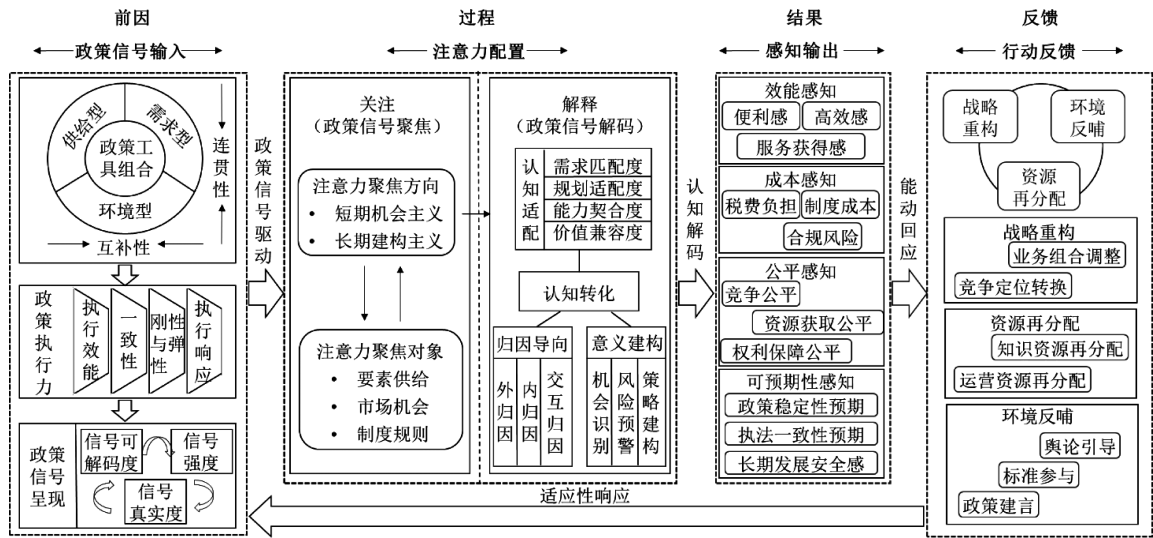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的形成机制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文对预留的5份访谈记录(A26~A30)开展三级程序化编码,检验理论饱和度。分析过程中,对所得概念进行范畴化,提炼出14个初始范畴,均与原有80个初始范畴重合。在整体编码过程中,8个主范畴层面未涌现出新的重要范畴及关联关系,各主范畴内部也未形成新的构成因子。因此,可以认为此次扎根理论编码过程达到了理论饱和。

四、模型阐释

(一)政策信号输入:企业感知差异形成的结构性前因

企业营商环境感知的生成始于政策信号输入

环节,这一前置要素也是催生不同企业感知差异的结构性根源。从传导路径来看,政策工具组合、政策工具融贯性、政策执行力与政策信号呈现构成递进的传导链条。政策工具组合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手段类型;政策工具融贯性反映各类工具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延续;政策执行力将文本层面的工具转化为实际治理行动;政策信号呈现则为企业注意力加工提供客观素材。四个范畴共同塑造企业接收政策信息的外部环境。

政策工具是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手段与措施^[29]。供给型工具聚焦于在“生产端”推动企业发展,包括资金、人才、技术和基础设施等

要素支持。需求型工具着力于在“消费端”撬动市场空间,包括市场塑造、政府采购、示范工程、服务外包等。环境型工具致力于“环境端”的制度化营造,包括税收优惠、法治建设、政府监督、保障措施等。三类工具分别发挥着推动、拉动与间接影响作用,构成企业感知政策环境的初始信号来源。

政策工具融贯性是政策工具组合发挥实效的关键条件。政策工具组合回答了“有哪些工具”,融贯性水平则影响着制度供给是输出逻辑一致的清晰信号,还是相互矛盾的噪声。其中,互补性要求供给、需求、环境三类工具在目标导向、实施手段、资源调配层面形成配合关系,避免工具间相互掣肘、功能重叠。例如,A22 反映“现在各类惠企政策都围绕降低企业成本、助力发展这一目标,整体上不存在冲突”,体现出了政策工具在目标导向上的协同匹配。连贯性则要求政策工具在战略布局上保持稳定、迭代调整上具备可预期性、制度规则上实现内在统一,防范政策频繁变动。比如 A18 提到“政府换届后,部分前期承诺的政策难以持续落地,导致项目推进受阻”,即为连贯性不足所引发的典型问题。

政策执行力是将政策工具组合与融贯性要求转化为企业可感体验的综合效能。具体表现为执行效能、执行一致性、执行刚性与弹性、执行响应四大维度,其强弱深刻影响着政策信号的呈现质量。如 A6 表示,“很多手续跑一次就能办成,多部门业务会主动协调对接”,体现出执行效能的提升。执行效能不足难以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甚至可能形成制度性障碍^[30],造成企业对政策意图的误读以及信任损失。

政策信号呈现是政策执行力落地后的关键信息输出环节,也是衔接政府政策供给与企业注意力配置的关键节点。具体表现为信号可解码度、信号强度与信号真实度三大维度:文本表述明确性、信息获取便捷性决定信号是否易被解读;宣传动员力度、激励约束导向影响信号捕捉效率;政策与执行匹配度、承诺兑现水平直接关乎信号可信度。如 A23 提及“很多优惠政策根本不知道从哪儿获取,等知道的时候已经截止了”,正是因信息

获取渠道不畅、政策宣传覆盖不足,降低可解码度的实际案例。

(二)注意力配置:企业感知差异形成的认知枢纽

受制于资源禀赋、战略定位与认知框架,企业会对政策信号进行差异化筛选与解读。注意力配置过程包括关注、解释和行动,基于政策工具—注意力整合视角,本部分聚焦前两个环节,将“行动”剥离至后续“行动反馈”部分独立阐释。其中,“关注”表现为企业主动识别、挑选出和自身发展战略或生存压力密切相关的政策信号;“解释”表现为对筛选信号进行认知加工并解释后,赋予这些信息相关内涵^[10]。

在关注(政策信号聚焦)方面,企业的注意力配置对象和聚焦方向存在差异化分布^[28]。一方面,注意力聚焦方向体现企业对政策信号的响应,呈现短期机会主义与长期建构主义特征。“短视”的企业倾向于关注生存型即时政策信号,注意力配置多呈现应激响应特征;“长视”的企业将注意力投向制度变革走向与战略机遇,表现出对制度环境的主动适应与前瞻布局。另一方面,注意力配置对象细化了企业的关注内容,涵盖要素供给、市场机会、制度规则三类。在编码阶段,当某条政策信号涉及多个维度时,以企业明确表达的关注焦点作为归类依据。三类配置对象在企业间呈非均衡分布,与企业资源位势、行业属性、制度依赖程度息息相关。如 B21 作为高技术制造企业,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标准;而 B9 传统服务企业则更关注政府采购机会与政商关系维护。

将注意力聚焦方向、配置对象作为两大划分维度,可形成 6 种不同关注组合(见图 2)。依托 Nvivo 交叉分析对比两类企业信号偏好后发现:短期机会主义企业侧重要素供给与市场机会,长期建构主义企业聚焦中长期市场机遇,据此提炼出红利捕获型、机会响应型、赛道布局型三类典型企业。

在解释(政策信号解码)方面,企业通过归因导向、意义建构与认知适配,完成从信号接收到认知构建的内在转化。归因导向体现企业对政策信号落地效果、冲突根源的认知判断,影响对营商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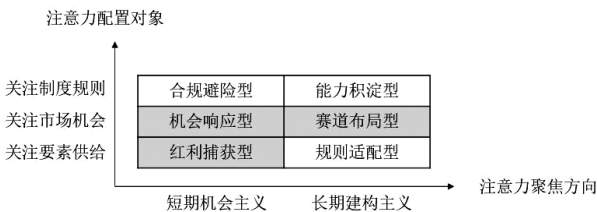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注意力配置维度的企业关注组合类型

境的价值评判。如 A1 将融资难归因于所有制歧视,A15 将中小企业中标失败归因于门槛设置过高,均强化了对公平性的负面感知。意义构建指基于符号化与叙事重构赋予制度环境意义,包括机会识别、风险预警等。认知适配是企业评估政策信号与自身需求、资源、能力匹配度的过程,适配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感知体验分化。如 A11 希望政府“量身定制服务”,反映对资源—制度适配的主动诉求;A9 因“政策推送不及时”,认为中小企业“机会流失”,体现能力—制度不匹配的感知。

(三)感知输出:企业感知差异的多维度具象呈现

感知输出是企业完成“关注—解释”两个环节后形成的整体营商环境评价,也是注意力配置从信息加工转向行动响应的认知终点。不同维度的感知强度与价值权重各有侧重,这种差异正是“同源环境、异质感知”在企业层面的具体表现。

(1)效能感知。聚焦企业对营商环境“实际运行效果”的直接体验,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便利感,指向政务服务流程简化程度、跨部门协同效率及办事便捷性;二是高效感,核心体现为审批时效、诉求响应速度与数字平台可及性,如 A28 反映“遇到新问题找不到明确责任部门,导致问题处理滞后”;三是服务获得感,侧重政策供给与企业经营需求的适配程度,如 A1 因“产业链扶持政策精准对接需求”,形成了良好的政务服务体验。

(2)成本感知。聚焦企业对“投入—产出”的经济理性判断,主要从税费负担、制度成本和合规风险进行评判。税费负担涉及税收、社保等显性支出。制度成本体现为政策对接、流程办理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人力,如 A7 因“拥有稳定对接渠道”,感觉到这方面的成本较低。合规风险指企业为达到监管要求而投入的预防性成本及潜在违规

代价。

(3)公平感知。聚焦企业对营商环境“机会平等性”的主观判断,包含三个维度:一是竞争公平,强调市场准入、招投标规则的透明与无歧视,如 A15 认为“招投标限制了很多条件,申请资质又需要时间”,这就是一种负面公平感知;二是资源获取公平,指向政策支持、要素供给的分配公正性,如 A18 反映“在财税、金融等方面都得到了省市区的贴心服务”;三是权利保障公平,涉及产权保护、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公正待遇。

(4)可预期性感知。聚焦企业对营商环境“长期稳定性”的信心判断,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政策稳定性预期,涉及政策延续性、换届承诺兑现度,如 A24 认为“许多一开始答应好的东西,到后面很难兑现”,A26 也提及“各项政策力度是很大,但落地到基层往往滞后”;二是执法一致性预期,关注监管标准在时间、空间、对象上的统一性;三是长期发展安全感,为企业长线战略布局提供心理支撑。

(四)行动反馈:感知驱动的适应性响应

企业注意力配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行动,包括战略决策、绿色创新等^[10,28]。企业形成了对营商环境的具体感知之后,不会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是会采取战略重构、资源再分配等反馈行动,反作用于政策环境与制度供给,形成动态循环。

(1)战略重构。战略重构是指企业基于感知调整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以更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本质是通过战略灵活性对冲制度不确定性,倒逼政策工具配置与制度供给优化。如 A17 所在中医药企业因政策供给与市场需求错位,收缩低端业务、聚焦技术研发,既提升自身竞争力,也推动产业政策贴合市场需求完成优化调整。

(2)资源再分配。企业会根据对营商环境质量和价值的综合判断,向优势赛道倾斜或捕捉政策红利^[28]。这一过程既反映企业对制度压力的适应性回应,又借资源流向政策端传递诉求信号。如 A9 因政策信息滞后而错失发展机遇后,加大政企对接投入,以此传递政策支持和公平竞争诉求,倒逼政府优化政策传达机制。

(3)环境反哺。企业会通过标准参与、政策建言等“自下而上”的规则重构,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促进政企良性互动。A5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主动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建言献策,表示“后来确实看到部分建议被采纳”;A21 频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认为“能让我们的技术路线成为行业规范”。这些行动改善了企业经营条件,也营造了更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

(五)三种代表性企业的营商环境感知形成路径及差异分析

为系统剖析企业异质性营商环境感知的生成机理,本文依托“政策信号输入—注意力配置—感知输出—行动反馈”动态机制,选取“关注(政策信号聚焦)”环节中形成的红利捕获型、机会响应型、赛道布局型三类企业进行对比。三类企业的注意力配置特征具有鲜明典型性,其完整感知路径直观体现政策信号传导与企业认知解码交互下的响应多样性。

1. 红利捕获型企业:短期政策红利驱动的机会主义感知路径(B14)

该类企业位于“短期机会主义×要素供给”象限。政策信号输入环节对信号强度尤为敏感,主要捕捉供给型及环境型激励工具的短期显性收益,信息可及性与兑付时效是其核心关切。注意力随政策周期动态切换,聚焦补贴、减税等直接资源收益。解释环节以内归因为主导,将政策获取归因于自身申报能力与关系渠道;意义建构以机会识别为核心,将政策信号解码为可操作的红利事项;认知适配强调需求匹配度。感知输出以效能感知与成本感知为主,对审批时效、兑付速度较为关注,对信息不对称、申报复杂度等制度成本感知强烈;公平感知易因信息滞后、门槛错配产生相对剥夺感;可预期性感知整体较弱。反馈行动以资源再分配为主,主动强化政企对接以抓抢红利,倒逼政府优化政策传达机制。

2. 机会响应型企业:短期市场机会驱动的响应型感知路径(B8)

该类企业位于“短期机会主义×市场机会”象限。政策信号输入环节兼顾信号可解码度与信号

真实度,重点关注市场塑造等需求型工具及环境型规制类信号,文本明确性与执行一致性是信任判断关键。注意力配置从要素供给转向市场机会,重点关注招投标透明度、准入壁垒与监管统一水平。解释环节采用交互归因,结合市场定位与竞争态势综合解读政策信号;意义建构同步推进机会识别与策略建构;认知适配强调能力契合度。感知输出中公平感知权重显著上升,对竞争中立性、规则透明性高度关注;效能感知聚焦于采购效率与资质认证周期;对隐性制度成本保持警觉;可预期性感知中等偏弱,倾向于在窗口期快速变现。反馈行动以业务组合调整为主,快速退出低价值领域,同时借助政策建言反映准入痛点,助推规则优化。

3. 赛道布局型企业:长期市场机会驱动的战略卡位感知路径(B17)

该类企业位于“长期建构主义×市场机会”象限。持续锚定中长期市场机遇,系统考量新兴赛道与业态。政策信号输入环节对信号真实度赋予最高权重,聚焦产业规划、国家级示范区等方向性制度信号,以政策协同性、稳定性、执行匹配度作为主要评判依据。解释环节采用深度交互归因,结合行业技术迭代与核心能力开展战略判断;意义建构以策略建构为主导,将信号转化为研发立项、产能储备等前置投入;认知适配强调规划适配度与价值兼容度。感知输出中可预期性感知与公平感知占据核心权重,视政策稳定性、执法一致性、换届承诺兑现度为长期布局制度前提;对短期成本容忍度高,但对标准不统一、执法波动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警惕。反馈行动以竞争定位转换与环境反哺为双重核心,主动卡位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通过标准参与、政策建言从“赛道跟随者”跃升为“规则共建者”。

红利捕获型、机会响应型、赛道布局型三类企业,通过差异化“政策信号输入—注意力配置—感知输出—行动反馈”路径,或聚焦短期政策红利捕获,或响应中短期市场准入机会,或卡位长期制度演化赛道,形成了独特营商环境感知模式(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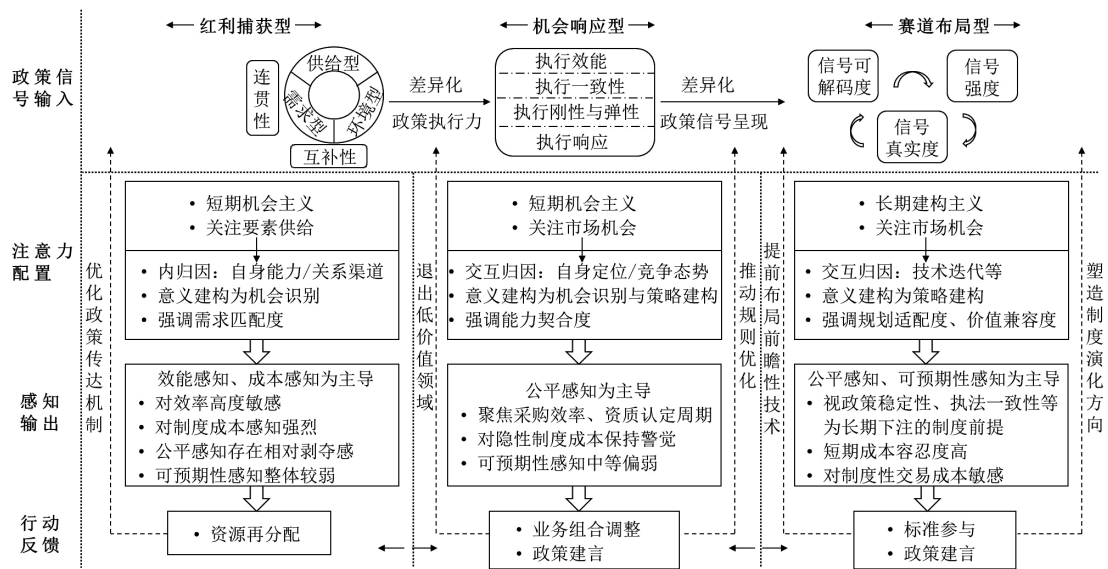


图3 三类代表性企业的营商环境感知形成具体路径与差异对比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结合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构建了“政策信号输入—注意力配置—感知输出—行动反馈”这一企业营商环境动态传导框架。

第一,感知差异的根源在于政策信号呈现引发的注意力配置策略分化。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工具构成具有互补性与连贯性的组合,框定了制度供给基本面向。政策工具从文本转化为企业可感体验,关键在于政策执行力。执行效能、执行一致性、执行刚性与弹性、执行响应四维度相互交织,塑造出信号可解码度、信号强度、信号真实度各异的制度信息环境。企业在复杂信号中动态配置有限注意力资源,经由“关注→解释”环节,形成对效能、成本、公平与可预期性四维感知的差异化权重分配及价值判断。

第二,依据注意力聚焦方向与配置对象的组合,可提炼出红利捕获型、机会响应型、赛道布局型这三类具备不同感知形成路径及结果的代表性企业。其中,红利捕获型以效能感知与成本感知为主导;机会响应型中公平感知权重显著上升;赛道布局型则是可预期性感知与公平感知占据核心权重。三类企业的感知差异反映了其对政策信号解码方式与价值判断基准的本质差异。

第三,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触发差异化反馈行动,反作用于政策工具组合、政策执行力与政策信号呈现。企业对营商环境与制度供给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基于具体感知主动响应。通过战略重构、资源再分配与环境反哺,企业反向塑造政策信号输入环节,形成“感知—行动—制度调适”的动态循环,使制度环境在企业能动响应中持续演化,既适配企业多元需求,也推动政府在精准识别政策堵点中动态优化制度供给。

(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从政策工具—注意力视角出发,刻画了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形成机制,为理解“营商环境同源性与企业感知异质性”提供了理论解释。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制度评价、资源获取和环境约束等视角考察感知呈现与变化规律,未能打通外部政策信号到企业主观感知的内在转化链条,且多依托量化统计方法展开分析^[13],仅能识别变量间相关关系。同时,政策工具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的结合多从政府“供给侧”出发^[31],较少关注企业这一政策“需求侧”如何解码政策信号并形成差异化感知。通过揭示政策执行力主导的政策信号呈现与企业注意力配置的动态交互过程,系统阐明了感知差异的微观生成路径。

第二,本文构建了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形成模型,提炼出红利捕获型等三种注意力配置策

略及其差异化感知路径,形成了可供后续研究实证检验的理论框架。现有研究往往将营商环境感知这一动态认知加工过程简化为单一维度评价,如所有权性质^[7]和竞争力水平^[15]等具体层面对感知的影响机理,缺乏对感知逻辑与行为响应的系统分析。构建的“政策信号输入—注意力配置—感知输出—行动反馈”机制,揭示了企业感知的动态认知加工与行为响应机理,弥补了过程性分析缺失,有助于推动营商环境感知研究从描述性分析迈向机制化解释。

第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并非制度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创新性地揭示了企业基于差异化感知的行动反馈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企业能动响应关注不足的局限。处于完全互利共生关系时,政府与市场能够在部分重叠生态位中相互增强^[32]。现有研究多考虑营商环境如何促进企业生产活动和发展^[33],较少探讨企业活动对营商环境的作用机制。本文系统诠释了企业如何基于具体感知,通过战略重构、资源再分配、环境反哺等策略反向影响政策信号呈现与政策工具的落地形态,完善了政企双向互动的营商环境演化理论。

(三)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政策信号呈现机制,提升制度供给的可解码性与真实度。一是制定政策文本编写规范,明确申报条件、兑付流程与责任部门,强化文本明确性与信息可及性。二是建立企业“政策画像”与需求标签体系,基于注意力配置特征进行数据建模,通过政务平台实现政策精准推送。三是建立政策兑现跟踪与反馈机制,将“换届断档”“上下温差”等问题纳入绩效考核,以稳定执行预期增强企业信任。

第二,构建差异化政策响应体系,精准适配企业注意力配置策略。一是针对企业注意力配置特征分类施策。对短期导向企业,强化政策兑付时效与显性红利可见性;对市场机会敏感企业,着力破除准入壁垒与规则不透明;对长期战略布局企业,提供稳定制度预期与行业标准参与通道。二是鼓励有条件地区建立企业“注意力配置画像”数据库,通过用户行为数据识别关注焦点,实现政策

供给与企业认知框架动态匹配。三是搭建分层分类的政策解读与常态化答疑机制,分行业、分主体开展专项政策宣讲。

第三,畅通企业行动反馈回路,推动政企双向互动机制动态优化。一是建立“企业感知指数”常态化监测体系,围绕四维感知设计季度追踪问卷,将感知变化作为政策调适的事前预警指标。二是将企业通过政策建言等途径提出的反馈意见纳入政策执行评估依据,对高频痛点开展专项整改。三是鼓励龙头企业与行业协会参与标准制定与规则共建,推动制度环境在企业能动响应中持续演化。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企业营商环境感知差异形成机制模型,但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样本数量相对有限,中部地区占比较高,可能无法全面涵盖所有企业的情况。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规模,涵盖更多元企业类型,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访谈集中于政策执行高峰期,对处于政策稳定期或市场成熟期的企业感知关注不足。同时,“行动反馈→政策反塑”这一动态闭环主要基于单一时点数据与理论推导,缺少纵向追踪支撑。未来研究可采用跨区域比较与纵向追踪设计,检验模型的边界条件与动态适应性。最后,本文以质性研究为主,研究过程可能受研究者主观因素影响,且缺乏大样本定量验证。后续可结合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构建量化指标体系,对模型中的各变量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深入探讨企业感知与发展绩效、创新能力等的多样化关系。

参考文献:

- [1]“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李志军,张世国,等.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的理论逻辑、比较分析及对策建议[J].管理世界,2021,37(5):98-112,8.
- [2]林赛燕.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企业满意度评价研究:以杭州市为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1(4):75-90.
- [3]谌飞龙.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8-19(4).
- [4]BACHMANN R, CARSTENSEN K, LAUTENBACHER S, et al. Uncertainty and change: survey evidence of firms' subj-

- ective belief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6, 116 (8): 2806-2849.
- [5] 邱康权,陈静,吕雁琴. 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地区差异与动态演变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2):121-143.
- [6] 白世贞,郑敏,魏胜. 我国中小企业成本、市场和制度障碍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3(2):146-156.
- [7] LI Dan, FERREIRA M P.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firms' sources of financial capital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1, 64(4): 371-376.
- [8] 姜楠,曹现强. 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 基于中央层面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1):96-113.
- [9] 杨斌. 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如何促进政策有效执行: 云南省 S 县政策“组合拳”的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24,21(2):128-140,175.
- [10] 倪慧,卫武. 众创空间的战略行动与竞争优势: 注意力基础观的视角[J]. 管理评论,2023,35(10):328-339.
- [11] 赵红梅,王文华. 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评[J]. 统计与决策,2022,38(23):28-33.
- [12] 武晓晨. 私营企业主的政府信任感知研究: 基于 2018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2022 (4):141-149.
- [13] ZHU Ye, SUN Minggui. Entrepreneurs' percep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s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warm impressions and competence impressions with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 [J]. Sustainability, 2023, 15(11): 8947.
- [14] THOMSEN S, PEDERSEN T.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argest European compan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6): 689-705.
- [15] 孙世强,张贺,吕平章,等. 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有效性: 识别、完善与检验: 兼论人民民主理论在营商环境评测工具建构中的应用[J]. 中国软科学,2023(4):189-200.
- [16] ANGELINO A, TASSINARI M, BARBIERI E, et al.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Vietnam: analysing the heterogeneity in firms' perception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J]. Competition & change, 2021, 25(1): 52-72.
- [17] 刘聪,高进. 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何以打好政策工具“组合拳”: 基于 46 个城市的组态分析[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5,40(2):104-117.
- [18] 罗兴武,钱伟,周丹,等. 营商环境、政策协同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工业互联网赋能政策的实证研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5,46(11):103-118.
- [19] OCASIO W, LAAMANEN T, VAARA E. Communication and attention dynamic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strategic chang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 (1): 155-167.
- [20] 孙佳怡,杨忠,宋孟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动态 QCA 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2025,39(3):58-69.
- [21] 李延喜,杨立佳,董维刚,等. 企业竞争压力感知、高管激励与数字技术创新 [J]. 中国软科学,2025 (2): 140-149.
- [22] 许晖,丁超,刘田田,等.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适应性成长路径与机制: 基于华源集团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 经济管理,2022,44(7):80-100.
- [23] PALMIÉ M, LINGENS B, GASSMANN O.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echnology decisions [J]. R & D management, 2016, 46(4): 781-796.
- [24] 刘伟,欧阳向霞,王田侯,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协同视角[J]. 技术经济,2025,44(8):80-95.
- [25] 万骁乐,李志军,罗均梅,等. 初创创新型民营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机制: 营商环境、政策感知和创新生态系统战略的联动[J]. 中国软科学,2026(3):174-185.
- [26] 郭劲光,王杰. “调适性联结”: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演变的一个解释 [J]. 公共管理学报,2021,18(2):140-152,175.
- [27] OCASIO W.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S1): 187-206.
- [28] 解学梅,韩宇航. 本土制造业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中实现“华丽转型”?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22,38(3):76-106.
- [29] 赵筱媛,苏竣. 基于政策工具的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框架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07(1):52-56.
- [30] 潘健平,马黎珩,范蕊,等. 央地交流与政策执行力: 来自政策文件大数据的证据[J]. 世界经济,2022,45(7): 181-204.
- [31] 彭小兵,彭洋. 乡村振兴中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差异与治理逻辑研究: 基于 410 份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22(9):80-88.
- [32]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 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2020,36(9):141-155.
- [33] 牛志伟,许晨曦,武瑛.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J]. 管理世界,2023,39(2):83-100.